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解析

——基于陇东南L村的调查

刘军奎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2)

摘要: 甘肃省东南部L村的个案表明,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 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流动的持续时间延长与范围扩大, 家庭的小型化与核心家庭剧增, 老人养老与子女赡养观念的分歧。为此, 有必要寻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养老模式。

关键词: 家庭养老; 人口流动; 家庭结构; 养老观念; 甘肃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2-0047-05

Causes of weakening in domestic function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rural area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A survey from L Village of southeast Gansu Province

LIU Jun-kui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2, China)

Abstract: The survey from L village of the southeast of Gansu Province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function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s weakening. The factors causing this phenomenon are: the time and the range of population flow in rural area have expanded;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been changing; the old people's sense of family support of old ag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ir children.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 new pension model.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of the old age; population flow; family structure; concept of family support of the old age; Gansu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农村家庭养老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并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频繁流动及二元结构下拉大的城乡差距而日益复杂。在此背景下, 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学者的一致观点是农村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在弱化且在社会转型时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 关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方面, 研究的侧重点各异, 主要有三: 一是王跃生、肖倩、刘庚长等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开展的研究, 认为家庭养老弱化源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微观家庭结构变化, 家庭结构变化一方面动摇了中国社会养儿防老“反哺”模式的支撑基础,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家庭代际关系, 二者均对家庭养老造成影响。^[1-5]二是张友琴、张文娟、康绍霞等从养老资源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所作的研究, 认

为目前家庭养老问题源自照料资源不足。老年人在经济、日常照顾和精神支持方面都面临着家庭支持资源减少的问题, 这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6-8]三是姚远、吕红平等从“孝”文化的角度开展的研究,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的赡养规范和孝的观念发生变化, 动摇了传统家庭养老的文化基础。^[9-11]也有学者认为, 年轻人价值观念在变化, 老年人独立意识也在增强, 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12-15]

已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是: 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研究和关注较多, 而对欠发达的西部农村地区关注较少; 从制度性社会保障角度研究的较多, 而以社会学视角作深入解剖的较少, 尤其是基于严密调查所得数据资料基础上的量化分析和实地考察基础上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基于此, 笔者把研究的着眼点放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养老问题更为突出的西部农村地区, 并选择地处甘肃东南部的一个村落社区——L村作为调查分析对象, 力图

收稿日期: 2011-01-07

作者简介: 刘军奎(1977—), 男, 甘肃天水人, 讲师。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从动态角度对社会转型时期西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做初步剖析。

在分析L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L村及调查样本的特征。L村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属西北山村社会典型的村落社区。截至2009年底,全村有居民196户,973人,共分四个村民小组,每个小组的户数、人口数大致相当。土地(含集体坡地、林地)面积2680亩,其中耕地面积1960亩,人均约2.01亩。L村以北至城区几十公里均属于黄土梁、峁、沟壑区,为黄土高原在陇东南地区延伸的末梢,往南不到5公里便是西汉水及嘉陵江上源的秦岭山地。

和许多偏远、落后的西部村庄一样,L村至今还是人力加畜力为传统的耕作方式,解决温饱的粮食基本能自给自足,但经济支出则绝对依靠村民外出务工赚取的收入,可以说是典型的“打工经济村”。十多年前,村里都是男劳力外出务工,女性在家操持家务、看管孩子。近几年村里女性外出打工者越来越多,有不少是夫妻双双走出家门,且女性的主要职业是做“进京保姆”。^①近几年,村里泥土房子越来越少,砖石结构的房子越建越多,全村彩电普及率达90%以上。一些结婚不久的青年男女房间布置非常讲究:彩电、VCD、摩托车、各种组合家具一应俱全。这些都是可见的明显变化。实际上,更大的、或许将会长期影响村庄发展的重要变化却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由于把L村当作一个独立的微型社会系统来看,研究所抽取的样本能否代表整体显得十分重要。因而笔者选择以L村196户居民中所有有老人的家庭户(87户)为抽样总体,然后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50个家庭户,最后确定所抽取的50个家庭及老人作为调查与访谈对象。^②50个样本中,男性21人,女性29人,其中42位老人有三个及以上子女,占样本总数的82%,甚至其中4位老人子女数多达7个以上(表1)。为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笔者还设计了与之配套的访谈提纲,以便掌握第一手的口述材料。

由于传统习俗和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观念影响,家庭在L村老人养老中仍处于主体地位,但家庭养老效果已越来越差。从调查样本反映的老人养老情况看,一类是年老体衰或重病在身,完全依靠

子女供养的老人,计13人,占样本数的26%。他们觉得生活缺乏尊严、不体面。据深度访谈,他们有的因不堪忍受子女的不孝顺而试图服毒或上吊自杀;一类是尚且能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老人。他们年龄一般介于60至70岁之间,身体基本健康,但子女外出务工期间还在承担着看管庄稼、照顾孙子女的重任。他们一旦生病、干不动农活或不能照料孙辈,就会陷入养老困境。

表1 样本与全村老年人口年龄构成比较

年龄组	样本结构		全村结构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60(岁)				
60-64	19	38	44	42.7
65-69	11	22	20	19.4
70-74	8	16	17	16.5
75-79	7	14	13	12.6
80以上	5	10	9	8.8
		样本总体值 n=50	全村老人总体值 N=103	

一、人口流动时间长与范围大

改革开放初至1992年,我国人口流动还没有摆脱制度安排的巨大影响,零星的流动并不能反映农民的意愿。^[16]1992年后,较为宽松、自由的农村人口流动才开始。L村真正的人口流动也是如此。据笔者获得的1999年底的资料,当时L村人口外出务工的比例已经比较高,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男性,流动范围以到省城兰州的最多。2004年则发生较大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是在近几年(表2)。与2004年相比,2009年L村流动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组合结构、流动持续的时间以及流动范围等均呈现新的特点: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增多;一次流动持续时间增长,持续一年以上(含一年)的人数比例由2004年的64.58%增加到2009年的80%,而且没有三个月以下的;流动范围由省内向省外拓展。2004年流向省外的不到一半(46.94%),2009年增加到69.4%。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外出务工的人口中,除了夫妻共同外出的比率较高之外,去北京作保姆的已婚女性日渐成为主流。截止2007年底,该村进京保姆占到外出流动人口总数的71%,占到外出流动女性总人口的88%^①,成为该村人口流动的一大特色。

表2 L村2004、2009年人口流动情况

流动情况	2004年		2009年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流动原因	上大学	5	10.21	12	16
	参加工作	3	6.12	9	12
	外出务工 ^①	34	69.39	47	62.7
	结婚外嫁	1	2.04	0	0
	其它	6	12.24	7	9.3
流动持续时间	一周	4	8.33	0	0
	一个月	6	12.50	0	0
	三个月	2	4.17	0	0
	半年	5	10.42	15	20
	一年	24	50.00	48	64
	一年以上	7	14.58	12	16
流动范围	本乡(镇)	7	14.29	3	4
	本县(市)	4	8.16	0	0
	邻县(市)	3	6.12	4	5.3
	省城	12	24.49	16	21.3
	外省	23	46.94	52	69.4
其它	0	0	0	0	

人口流动的规模扩大、持续时间延长与范围扩大,导致L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无法阻挡地逐渐式微,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其一,村里越来越多孩子考上大学外出读书,一方面是当地教育和文化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孩子求学的高额学费使一些中年父母陷入了经济困境,因而在承担家中老人赡养责任时显得力不从心。其二,无论从心理慰藉上还是现实照顾上看,子女一次流动持续的时间对留守家中的老人养老有明显影响。持续流动时间越短,老人的孤独感和无依无靠感会越低,反之则越高。流动时间越短,老人得到的来自子女的直接照顾会越多,反之则越少。其三,子女流动的范围决定了其空间上的流动距离,越是更多地流向外省,越是很难为老人提供赡养服务。就L村目前的实际看,流动到外省的绝大多数是在北京,且多为已婚女性,即儿媳妇。由于特定的观念和习俗,L村至今负责老人日常照顾的对象主要是儿媳,尽管婆媳矛盾向来较为复杂,但承担老人饭食、起居等各方面照料的无疑仍是媳妇。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养儿防老”,更多时候实际上是老人凭借儿子由媳妇来养老。因此,媳妇长期离家往往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下降,特别是老人生病需要照顾期间,媳妇照料的缺位常常致使老人病情加重。

调查还发现,夫妻两人共同外出的家庭的老人,

他们不但没有人照顾,反而要替子女看管孩子、操持家里家外,额外增加了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强度。访谈中一位老人的口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状况。

S老人:我今年69岁了,人家(儿子、儿媳)正月十六就走了,到现在还没来。这一年,家里里里外外我一人担着。虽然再没种地,没种庄稼,可饭总要吃、水总要想(挑)吧?头痛脑热害病吃药打针就不说,油、盐、酱、醋总要用吧?你的两个娃娃总要花费吧?一年了,只有6月里托人捎来了200元,你说良心在啥地方?我说把我吃不上、喝不上,死了也不要紧,都一把老骨头了,有啥舍不得?可人家娃娃不行啊!两个一般大,都上学,一个二年级,一个三年级,放了学回来就要吃,走的时候还要拿,我不把命豁上供能行吗?加上这两个(孙子)也不听话,我又管不住,天天打架、骂仗,给我闯祸端。唉,我都不知道我的死日子啥时候能混到头……

二、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剧增

L村家庭结构变迁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家庭规模变化明显,呈现出小型家庭化的趋势。L村家庭总户数1985、1995、2004、2009年依次是76户、121户、174户、196户,2009年比1985年净增1.58倍;全村总人口1985、1995、2004、2009年依次是485人、667人、871人、973人,2009年比1985年净增1.01倍;家庭规模1985、1995、2004、2009年依次是6.38人/户、5.51人/户、4.99人/户、4.96人/户,降幅达22.2%。由此可见,L村25年来,总户数及总人口均有显著增加,家庭规模却日趋小型化。这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成年子女结婚后与父母分开居住倾向的不断加强有关。二是家庭构成变化显著,核心家庭剧增。L村从1985年到2009年新增加了120户,绝大多数是核心家庭,即多子女家庭因分家而从原来的联合家庭中分离出来的家庭。当然,主干家庭依然占有一定比例。如50户调查样本中,主干家庭却有30户。这与所选择调查对象有关。调查对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而涉及到的必然是老年家庭。L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其子女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上,基本都已结婚成家生子。因此,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为主,但这并不影响整个村落家庭结构的核心家庭化趋势。

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家庭关系出现了由以往纵向的“亲子轴”关系向横向的“夫妻轴”关系转变,进而家庭中心也出现下移。L村50户样本中,较为普遍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同堂式主干家庭的老人受关注程度远远低于孙子(女),老人在居住和生活照料方面均处于不利处境。以住房为例,调查表明,72%的老人居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修建的房屋,且一般是和正房相接一体的厢房/偏房(表3),居住条件很差。特别是80年代以前修建的房子,结构虽然高大,但由于年久失修,加上长期烟熏火燎,房间昏暗、潮湿,另外还堆放着各种农具杂物,使房子更加显得拥挤不堪、气味难闻。老人长期居住在这样的房间,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表3 L村老人住房情况

建房时间	频次	百分比/%	您现在住房?	频次	百分比/%
80年代前	36	72	厢房(偏房)	30	60
80-90年代	8	16	独立小房子	12	24
90-2000年	4	8	正房	8	16
2000年后	2	4			

三、老人养老与子女赡养观念存在分歧

老人赡养不仅由时代所具备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其上的人们的价值和思想观念的制约。以“孝”文化为核心的家庭尊老、敬老、养老文化在我国有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而罪莫大于不孝。”^[17]然而,受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农村年轻一代尤其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孝道价值观念逐渐转变以致淡化,农村留守老人却继续抱着“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二者观念的分歧自然会弱化家庭的传统养老功能,L村也不例外。

1. 老年人的养老观念

根据访谈得知,L村老年人普遍认为,做儿女的就得尊重、孝敬老人,老人理所当然应得到儿女们的敬重和爱戴,且这种“敬”与“孝”不是因为带有交换色彩的抚养和赡养关系,而是一种做儿女的必须履行的义务,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必须要尽到的责任。万一遇上子女不孝顺的情况,他们倾向于将其归结为自己前世“造了孽”(老天爷饶不了他

们)或儿女们在“遭罪”(下辈子要受惩罚),如此而已。因为有这种观念作内在平衡,无论子女对自己是否孝顺,老人都别无选择地为子女的幸福操劳奔波。比如,在问到“如果您现在有一笔钱,您打算怎样花销?”时,有57.8%的老人选择了“留给子女供自己养老”,而选择“存入银行供自己养老”和“自己带着花销”的老人分别仅占17.3%和24.9%。

关于养老方式,从目前L村老人的整体意愿来看,他们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如在问及“您赞同下面那种养老方式?”时,回答“靠家庭子女养老”的占据绝大多数,达92.0%。古往今来,居家养老几乎是每个“有家”老人的最大心愿,与子女在一起生活,含饴弄孙,享受儿孙们敬老、爱老带来的快乐是老人们最大的愿望。老人养老的方式以靠积累自养、靠子女供养、配偶供养、其他直系亲属供养为主。^[18-20]据进一步访谈,几乎所有老人都认为,依靠国家、村集体或进养老院是无儿无女的孤老的归宿,有子女的老人是不会进养老院的,倘若进了,也是儿孙不孝的表现。

2. 子女的赡养观念

据访谈,L村老人的子女基本上都曾经或正在外出务工。他们外出务工后其思想观念主要发生如下变化:独立意识增强、对家长的反叛态度日趋强烈、享乐主义思想浓烈。例如青年人已不再遵循严格的父子、兄弟、姐妹等家庭长幼秩序,而是更倾向于追求一种家庭成员内部的平等和民主,甚至要求许多方面由他们说了算。青年子女与父母、祖父母顶嘴、吵架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偶尔动起拳脚也不足为怪。子女们经常埋怨家长过于古板、爱唠叨,事事纠缠自己,阻拦自己;近几年内已有十多个未婚女青年不顾父母反对在外地找到对象并结婚,有个别因家长反对而未婚先孕者更是引起村庄不小的震动;十分注重满足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友谊、尊严、社会认同)的需求和欲望,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对耐用消费品、奢侈品的要求不亚于城里人。在外见过“世面”的他们有不顾实际、盲目追求潮流、盲目攀比的倾向:抽烟、喝酒、泡吧、上娱乐场所找乐子,等等。每逢春节临近,年轻的“进京一族”带着满身洋气返回家乡,她们穿着款式别致的衣服,佩戴着价格低廉但颇显时髦的各种首饰,肩上挎一个时尚的挎包。

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赡养

观念：对孝文化价值观念认同感不强，敬老意识淡化。经历城市洗礼之后的年轻农民逐渐习惯流连于城市，回家显得似乎并不那么紧要。他们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看望父母，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面对年老的父母，他们试图学着像城里人一样选择养老院作为父母最后的归宿，而不管老人的感受。

进一步访谈还发现，L村年轻农民对老年人的孝顺标准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为对于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孝顺就是每年能兑200斤左右的粮食，只要兑现了粮食，父母没有饿着，就是孝顺。在他们看来，对于年老父母的赡养，就像对付有某种义务的陌生人一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算计关系。在这个算计过程中，父母履行某种义务，子女才履行赡养的义务。父母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为子女盖房娶老婆，照顾小孩，有劳动能力时帮忙干农活等。只有在完成这些事情之后，当父母年老时，子女才会担负起赡养的责任。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没有完成都会成为子辈拒绝赡养的充分理由。

这样，不难理解L村为数不少的老人坚持与子女分开单独生活的现象。这些老人居住的是独立于庭院的小房子，与子女另吃另住。但对外保持一种“分家不分户”的现象。因为，对于老人的儿子、儿媳来说，老人的“有用性”不存在了。其一，自己的孩子往往已经会吃、会喝，甚至上小学了，平时不再需要父母照看；其二，年轻人喜欢热闹，需要看电视，唱卡拉OK等，而喜欢清静的老人对此又听不惯，常常互相抱怨，以至发生口舌之争；其三，年轻媳妇一怕麻烦(老人吃饭要软、烂，味道要淡)，二嫌老人脏，不讲卫生，不愿和老人一起吃住。他们尽管与老人没有彻底分开另立门户，但与老人间的沟通减少，大大降低了养老质量。

注释：

- ① 参见笔者《进京保姆：一种特殊的女性劳动力转移模式》一文，2010年《西北人口》第1期。
- ② 具体抽样时，笔者对87个老人户进行了编码，以随机方法抽取了50户。抽中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老人的家庭，只调查其中一位，且以偶号取男、奇号取女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有两代老人的家庭，选择更年老的一代为调查对象。
- ③ 在这34个外出务工者中，夫妻共同外出的有4对(8人)；

丈夫在家，妻子外出当保姆的有6人；丈夫与妻子各自打工的有2户(4人)；其余16人全部为未婚青年(男女均有)。

参考文献：

- [1] 萧振禹. 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困惑[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26.
- [2]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1983(3):12.
- [3] 王跃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10(4):116.
- [4] 肖倩,杨泽娟.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与老人赡养问题——对赣中南农村的实证研究[J].求实,2010(10):93.
- [5] 刘庚长.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J].人口研究,1999(3):41-42.
- [6] 张友琴. 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5):115.
- [7] 张文娟,李树苗.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5(5):73.
- [8] 康绍霞. 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探析——以河南省罗山县F乡Z村为例[J].社会工作,2009(11):52.
- [9] 姚远. 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50.
- [10] 吕红平,李振纲. 孔子孝道观与家庭养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8(2):85-86.
- [11] 杨淑娥,孙宝庆. 中国养老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出路[J].河北学刊,2010(5):167.
- [12] 王义才. 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险相结合是解决农村养老的必然选择[J].新华文摘,2001(2):113.
- [13] 潘金洪.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
- [14] 陈建兰. 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实证研究——以苏州农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9(4):47.
- [15] 宋璐,李树苗. 当代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13.
- [16]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3-34.
- [17] 岳庆平. 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91.
- [18] 孙慧明.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探析——基于豫东农村的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38-44.
- [19]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07.
- [20] 冯立天,马瀛通. 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能力辨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2(2):11.

责任编辑：陈向科